

太昊伏羲作为中华民族始祖、文化的肇始者，被奉为“三皇之首”、“百王之先”，他“定姓氏，制嫁娶”“教人网罟”“有圣德”，对华夏文明的延续发展起了极其伟大的作用。因此历史地位十分显赫。在对他事迹的有关文献中，古人对他有不同的称谓，再通过文字上的同音相代，其称谓就更是繁多，有人读到他不同的称谓甚至不知道都是指太昊伏羲。本文现就古今对其较常用的加以辨析考证，把笔者发现的称谓列一“清单”。

《纲鉴易知录》说人祖“有圣德，像日之明，故曰太昊”。太，意为极大；昊，从“日”从“天”，指浩宇中日月之光辉。古文中“昊”往往又是“昊天”之省。《诗·小雅》有“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”也有“有北不授，投畀有昊”。这里“有昊”的“昊”，就是“昊天”之省。人祖太昊这光明磊落浩然博大之称谓，和他对远古社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。

古人写文章或抄书多用通假。即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代替，相当于现在的写别字。古文献中对“昊”多有通假之处。

皓，又通作昊；太皓，天也。在《荀子·赋篇》中，后人给“皓天不复”句作的注就是“皓同昊”。在《楚辞·远游》“历太皓以左转”句的注中，也说“皓即太皞也”。

《后汉书·朗传》“陛下若欲除灾昭祉，顺天致和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，乃加斥黜，以安黎元，则太皓悦和，雷声乃发。”这里的“太皓”也是“太昊”。

“昊”与“皞”也相通，故“太昊”又写作“太皞”。《礼·月令》有“其帝太皞，其神句芒（人名，太昊重用的木正之职）”之语，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“皞”字旁从日，是左形右声，在唐代三石刻经上，现在还可以看到这个字的左旁是“日”。至于后来变“日”为“白”，是将错就错使然。

北宋刘恕著《通鉴外纪》一书说“太昊始作网罟，以佃以渔，以赡民用，故曰伏羲氏。”从这段文字上可以看出，“伏羲”是太昊的另一个称谓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伏，司也；羲，气也。太昊、伏羲从意上说有内在联系。

因通假，“伏羲”在古文献中也有“宓羲”“宓戏”“伏戏”等多种称谓。

战国时代荀子著有《成相篇》，在抒发他的治理天下理想时说“基必施，辩

贤罢，文武之道同伏戏”，文武，指周文王和周武王，而伏戏即伏羲。

太昊、伏羲连称最早见于《世本》，

书中有关“太昊伏羲氏，东方木德之帝也。”据此，可知伏羲即太昊伏羲。《世本》是西周至战国期间由史官相继而成的著作，主要记载帝王、诸侯姓、氏和世系。这说明“太昊伏羲”连称至少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。

汉朝的毛亨为《诗经》中的《陈风》作传，特提到太昊，“陈者，太皞虐戏氏之墟也”，又写道“虐戏即伏羲，字异音同也”。把话说得很明白。

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作“太帝宓羲氏”。

《礼·月令》注“大宓羲氏”。宓，在这里读作“伏”。古有“宓”姓，如春秋的鲁国为孔子所称道的贤者“宓不齐”。

“宓”字上边的“宀”，是指“场所”；

“宓”的本义指“心脏真实存在但不可看见”转义为“隐藏”。“宀”与“必”以上下结构的形式结构，表示是“隐藏的处所”。

而“伏”字从人从犬，意为“人像狗那样趴着”，再引申为“隐蔽自身”。故“宓羲”“伏羲”都有隐藏的意思。“宓”与

李郁

“伏”是近义词，读音相同，字意相近，自然也就相互代替了。所以“伏羲”又作“宓羲”。

到了南北朝，北齐学者颜之推对“宓”“伏”二字严加考证，认为二字不是通假，而“宓”是“虐”之讹，是在传抄中误写了，应该是“虐羲”。他把他的论证和结论写入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中，并渐为社会所认可，南北朝之后很少再有人将“伏羲”写成“宓羲”或“宓戏”了。但这也说明了“虐”字，在古代也有和“伏”相同的读音。

人祖的另一个称谓是“庖牺”，《纲鉴易知录》：太昊“养牺牲，以充庖厨，故又称庖牺氏”。牺，指纯一色的家畜；牲，指用来祭祀而宰用的猪、牛、羊；庖，屠宰之处；厨，烹饪之所。这说明当时社会已由单纯打猎过渡到饲养，并有了屠宰场所，人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和改善。这一切太昊功不可没，故又叫“庖牺氏”。

这一称谓，这已有很强的纪念意义了。因“庖”“包”二字音近，因通假，故“庖牺”又写成“包牺”。《易·系辞下》“古者包牺氏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伏则观法于地”。

庖牺，在古文献中也写作“炮牺”。

如《汉书·律历志下》：“《易》曰：‘炮牺继天而王，为百王先，首德始于木，故为帝太昊，作网罟以田渔，取牺牲，故天下号曰炮牺氏。’”

按说人祖称谓“伏羲”与“庖牺”不应交叉，但由于羲、牺音同，也有参错而称的。清朝的谢逢源在他的《龙川夫子

言谱》中说“包羲，天子也；文王，诸侯也；孔子，陪臣也；太谷，庶人也。”

另外除了正规的称谓外，太昊伏羲还有自己的别号。如东晋王嘉在他的《拾遗记》中说：“春皇者，庖牺之别号。”

朱裕基总理曾为淮阳题词：“羲皇故都”。太昊伏羲为什么要称“皇”？这和古文献中的“三皇五帝”有关。传说中的三皇有三种说法：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；伏羲、神农、祝融；伏羲、女娲、神农。三说皆以伏羲为首，所以世称伏羲为“三王者”。古文献中也多有称伏羲为皇之处。如曹植的《汉二祖优劣论》中有“高尚纯朴有羲皇之素”。

伏羲不仅是三皇之首，同时也是五帝之尊。五帝是伏羲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。古人对帝的解释是“帝者，王天下之号也”，也就是说在天下为王的人可称之为帝。伏羲曾“王天下”“作都于宛丘”，以帝称之是理所当然。

伏羲称皇称帝，为什么带要称氏呢？其实太昊伏羲氏的“氏”和姓氏的氏无关，因为伏羲是风姓，他生活的时代“氏”文化还没出现，“氏”比“姓”的出现要比伏羲生活的时代晚得多，所以伏羲生前不可能以“氏”相称的。这是古人在文献中对伏羲的一种特殊的尊称。

三代以前的帝王因事迹无文字可考，多是口口相传。古人根据历史上口传人物事迹，对于社会发展有巨大贡献的人都加“氏”以表尊崇。如神农氏、燧人氏……最后称氏的帝王是舜——有虞氏。

对人祖的称谓不仅不同书中称法相异，就是在一篇文章里称谓不统一的也不少。如《庄子》一书中，有五处关于人祖的记载，其称谓就有“伏羲”“伏羲”“伏羲”“伏羲”三种。

至于称伏羲为“人祖”“人祖爷”，在古文献中难以见到。但是，却在民间村妇田夫口中广为流传，而又约定俗成。



寿命仅仅几十年的牲口屋

王天瑞

说公社、说大队、说生产队，不能不说生产队的牲口屋。牲口屋，又叫社屋。它是那个时代派生出来的一种形式、一种事物、一种传奇、一种发明。它在那个时代的大染缸里染上了那个时代的浓浓色彩。

轰轰烈烈、轰轰隆隆……跟随“人民公社好”的伟大指令，农民们入了社，成了人民公社社员；土地入了社，小片连成了大片；耕畜、农具入了社，这样，牛、驴、马、骡……杈、耙、扫帚、扬场锨……石磙、耢石、赶牛鞭……它们额头上就刻上了千百年来独有的红火、滚烫、灼人的“公”字符号。于是，牲口屋诞生了。

黄村生产队的牲口屋，从外表看，很气派、很威武、很壮观。刚刚入社的社员们，恨不得把一颗心掏出来献给人民公社。听说生产队要建牲口屋，无不倾其所能，任不吃、不喝、不用，也要捐献出手中的钱，也要捐献出家中的砖、瓦、梁、檩、椽、板……

黄村生产队的牲口屋，是一拉一溜的青砖蓝瓦屋，坐北朝南，一共九间。这屋子很“野”，这一间屋可比民居的一间要长得多、宽得多、大得多。西头的三间是农具库，东头的三间是粮食仓，中间的三间是饲养室。饲养室的东间，喂快牲口——驴、马、骡；西间，喂慢牲口——老黄牛。饲养室的中间，南半边是空地——可供人们自由活动；北半边是草窝——把提前铡细的麦草储存草窝里，随用随搬，喂牲口方便。饲养室东间与西间的两排牲口槽，相对着。进门两边的靠墙处，摆两个腰高的淘粪缸。室内从檩子上吊下一个玻璃罩子大马灯，饲养员为保证灯光明亮，每天都要擦一遍。你可别小看这个饲养室，从内部看，简单又土气，甚至土气得掉渣，它却是全队的文化活动中心哩！

喂牲口，是个操心、细致、辛苦的活儿。因为牲口不会用嘴巴“说话”，也不会用肢体“表达”，这就要求饲养员必须具有与牲口交“朋友”的高度责任心。平时，既要善于观察牲口的“心情”，又要千方百计满足牲口的“需求”。饲养员喂牲口时，要把麦草淘洗干净，要把草料搅拌均匀，要让牲口适时饮水——俗话说“饮牲口”，要保证牲口吃饱喝足，要经常给牲口挠痒、梳毛，要定期给快牲口打蹄子——切除脚蹄板下的老茧，要谨防牲口互相抵头、咬架、蹄蹬、攻击。农谚常说，马无夜草不肥。饲养员每夜都要给快牲口喂一次草料。于是，那个玻璃罩子大马灯，也就轰轰烈烈地不知疲倦地夜夜常明。

牲口屋的大院子里，栽着几排木

桩子，那是拴牲口用的。牲口喂饱后，如果没活干，就把它们牵出来，拴在院子里兜风、晒太阳。如果从地里干活回来，还不该喂草，就把它们拴在院子里歇息。每当这时，院子里就很热闹，牛摆尾，马昂头，毛驴咴咴叫，骡子互相啃背、互相咬耳朵，仿佛都在享受着幸福和快乐。

牲口屋，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。院子东南角有两个大土堆，像两座山，是从薅过棉柴的地里起的土，干燥、松软，还夹杂着碎草和干花叶，准备冬日垫牲口铺用。虽然孩子们没有见过山，但却看过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，他们在这些座山上，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大无畏精神，冲锋陷阵，浴血奋战，常常忘了吃饭、忘了睡觉、忘了做作业，很多时候都是在父母的呵斥声中恋恋不舍地回家去。其实，孩子们还有一个小秘密，想吃“料豆”。饲养员把黄豆炒熟，又焦又脆又香，磨成料，拌草喂牲口。孩子们想吃“料豆”，饲养员不让吃，有时从地上拣几个撂嘴，嚼得喷喷香，便乐得拍屁股打跨直蹦高。

冬天，大雪飘飘。饲养员怕牲口冻着，就不断点燃柴草，把屋里烧得热烘烘的。于是，饲养室便成了百家讲坛。天一黑，老的少的拿着红薯、揣着玉米珊瑚而来。饿了，把红薯、玉米埋进灰里烧着吃。有一位高中生，回乡务农，买到一本人民出版社刚刚出版的《不怕鬼的故事》，读完后，给大家就讲饿死鬼、屈死鬼、吊死鬼、淹死鬼……讲骂鬼、驱鬼、打鬼、捉鬼……岂料，小孩子越听越怕，吓得不敢出门撒尿、半夜不敢回家，只好躺在草窝里睡大觉。有一个刚结婚的小青年，害得媳妇夜里央求嫂子来找他回家。

说起来令人不寒而栗！社员们连糠菜也吃不上了，一天，生产队的一头老黄牛瞪眼饿死，都想分点牛肉吃，干部们也答应人头分肉。岂料，生产队干部一大群，队长、会计、记工员、保管员、妇联主任、民兵排长……把你牛肉偷走一块，把他牛肉搬起来一块，又给大队的干部们送点，到社员们来分牛肉时，只剩下一张老牛皮。社员们陡然起火，操起铁锹、抓钩、镰刀、木棍……要与干部们决一死战，干部们自知理亏，连夜逃向远方……

人民公社崩溃了！村长说，我们把这个牲口屋分了吧。于是，默默无语的村民们，你抬一个梁，他扛两根檩，我拉走一车砖……

寿命仅仅几十年的牲口屋啊！寿命短暂的牲口屋！



进军朝鲜

二、暗流涌动

壬午兵变震惊四方，各派势力积极运筹，伺机候隙，蠢蠢而动，重掌政权的大院君政府周围，一时间暗流涌动，危机四伏。

日本侵略势力是事变中被汉城军民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，所以，他们在兵变中亦是损失最严重的一方。接到驻朝公使房义质的报告后，日本政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，虽然决定采取“慎重”策略，但仍做出一系列强硬反应，在外交和军事上对朝鲜施加压力，借机攫取更多、更大的利益。

外交方面，任命花房义质为全权委员，赴朝鲜要求谢罪、赔偿。全权委员直接接受外务卿井上馨指挥；军事方面，派出陆军第十三联队的一个大队（约一千五百余人），作为全权委员的护卫部队，分乘“金刚号”等四艘军舰，“明治丸号”等两艘民船，一并前往朝鲜，炫耀武力，加重谈判筹码。

同时组编一支混成旅，抽调“高砂丸”等四艘运输船在福冈待命，随时准备渡海赴朝。日本民间的右翼团体“玄洋社”也伺机而动，如果政府不采取军事行动，他们将组织“征韩义勇军”，由釜山登陆进攻汉城。

事变在日本激起的强烈反响，被中国驻东京公使黎庶昌侦知，他连续两天向总理衙门和北洋官署发电报报告情况，建议尽快采取行动，出兵朝鲜。“眼下，日本派出军舰3艘已处理此事”，“日本本兵船即赴高丽，中国似拟派兵船前往观变。”

历经九死一生，潜逃忠州湖院的闵妃愈挫愈坚，并没有放弃重新登台执掌政权的希望和努力。她处乱不惊，冷静权衡，最后把复兴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干涉之上。她派心腹人员秘密与高宗取得联系，告知高宗自己近况安好，坚定他斗争下去的信心；策略上，她建议高宗邀请清政府出兵朝鲜。高宗通过密使了解到闵妃的实情后，大

袁世凯与近代朝鲜

范闻杰

袁世凯与近代朝鲜

到中国请朱元璋钦定。朱元璋亲自选定，以“朝

鲜”为国号。为方便与“箕子朝鲜”的区别，史称其为“李氏朝鲜”。李成桂的朝鲜和朱元璋的大明，从此建立起明确且亲密的藩属关系。这就是朝鲜历史上著名的“事大主义”外交政策。

“事大”一词，语出《孟子·梁惠王》，原文为：齐宣王问：“交邻国道乎？”孟子说：“有。惟仁者能以大事小，…惟智者能以小事大，…(仁者)保天下，(智者)保其国。”

所以，“事大主义”说白了就是：大国宽仁，靠自己的实力和信誉，保护小国，承平天下；小国智慧，尽心侍奉大国，保有社稷，安邦定国。

19世纪初叶以前的数百年间，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，存在着一个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。长期以来，周边邻国的统治者为了自身的政治、经济利益，都与中国的统治王朝建立并保持一种特殊的封建依附和“朝贡”关系，他们各自对本国的统治权必须经由中国朝廷的“册封”加以确认。这种封建的宗藩关系，构成所谓的封贡体系，朝鲜是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。”

朝鲜的李氏王朝是个很长寿的王朝。他建国于1392年，如果以1910年朝鲜帝国被强行并入日本，朝鲜灭亡为止，李氏朝鲜王朝前后或盛或衰地延续了七十七代，凡五百一十八年。

1388年，当时统治朝鲜半岛的高丽王朝反明，派大将李成桂远征辽东半岛。李成桂多次请求回朝，都被国王和权臣拒绝。李成桂进退维艰，发动政变，推翻高丽王，立其幼子为王。后再经废立，李成桂便不耐烦了，1392年他索性自己登基，建立了李氏王朝。

他一改前朝和明政府的敌对态度，采取亲明的外交政策。定国家名称时，李成桂将自己拟定“朝鲜”（商朝箕子曾在朝鲜建“朝鲜国”），“和宁”（李成桂出生地）两个名字列出来，派使臣

长存不亡的保证。丰田秀吉时代，日本在“海外雄飞论”思想的鼓动下，向朝鲜半岛扩张，朝鲜得到大明政府的鼎力援助，并取得最后的胜利。而且正是这种藩属关系和明朝政府的支撑，在很长时期内有效地抑制了日本侵略、吞并朝鲜的野心。

闵妃所以建议高宗请求清政府出兵为戡乱，正是基于这种政治背景。根据藩属国的规定，每当新王继位，都要由皇帝赐予金玉，册封新王。朝鲜奉中国之正朔，定期纳贡，并派出各种使节，如燕行使、陈奏谢恩使、冬至使、进贡使等到中国“贺正”。

这种频繁的政治文化交往，使朝鲜三千里锦绣河山深受中国文化的侵润。首先，从文字上看，朝鲜本民族的文字称“谚文”，多在市井民间使用，官方的通行文字是中文，所以朝鲜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都有很高的汉文化造诣，直到今天中国的史学学者在研究近代史时，特别是中、韩、日近代关系史时，那些用中文写就的朝鲜官方文献记载，和个人日记信札，还都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；其次，朝鲜亦实行和中国明清两代一样的科举制度，所考内容亦是中国古典“四书五经”，考试结束后，状元亦需要到北京，接受中国皇帝的钦点；之外，从官制设置看，根据中国的六部，朝鲜政府设六曹，其职能和职责和清政府六部相类似。

2005年韩国“江陵端午祭”申遗成功，引发中韩之间的文化之争。其实这种相互指责的争论并无太大必要，学术问题可以用共同研究去搞清，但中韩两国文化的同源性，应是不争的事实，也是两

国文化交融源远流长的明证。